政治科學論叢 / 第五十八期 / 民國 102 年 12 月 / 頁 47-70

美國國關學界對中國之評估：以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爲例*

唐欣偉**

摘　要

除權力轉移論者外，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家在 21 世紀前幾乎都不認爲中國的實力會趕上美國。直到北京的實力已無法忽視，才將之描繪成美國最大的對手。

從權力政治觀點出發的攻勢現實主義者，認爲強大的中國必將挑戰美國，所以華府要阻撓其發展。但同樣重視權力的權力轉移論者則主張，新興強權若對國際現狀感到滿意，就不會挑戰，所以美國應與中國合作。這兩派對國際體系本質、國力衡量方式，與國家意圖是否值得探究的看法都不同。對國家意圖看法的差別，使它們對華府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中國崛起、攻勢現實主義、權力轉移論、軍費開支、GDP

---

* DOI:10.6166/TJPS.58 (47-70)。本文爲國科會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NSC 100-2410-H-034-057）。作者向惠賜卓見之審查委員致謝。

**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hwtang@mail.fgu.edu.tw。

收稿日期：102 年 4 月 19 日；通過日期：102 年 12 月 6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晚近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國際關係學界認爲「中國崛起」（rise of China）是該國在未來10年內所面對之最重要外交議題（Maliniak et al., 2012: 82）。看過 2012 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之全球趨勢報告初版的多數人也認爲，華府與北京的關係，可能是形塑未來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 4）的關鍵。

究竟美國國關學界對中國有何看法？本文從冷戰時期最具影響力之學者的學術專書開始回顧，然後聚焦於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這兩種常用來評估中美關係之理論。在比較它們的異同後，評析其對中國、中美關係的主張，以及這兩大理論的不足之處。

貳、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地位之評價

一、20 世紀後半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美蘇兩極對峙初期，重視權力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家 Hans Morgenthau 就認爲中國可能在未來成爲新的一「極」（1955：327-328）。另一位古典現實主義者 Henry A. Kissinger 將中國與蘇聯相提並論，同時探討中蘇共的戰略思想（1969：43-80），後來還在 Nixon 總統任內促成華府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但在冷戰後期最具影響力的結構現實主義者 Kenneth N. Waltz，卻指責 Kissinger 與 Nixon 對中國評價過高（1979：130）。Waltz 列出 1700 年至 1979 年以來的強權名單，其中並不包括中國（1979：162）。[1] 他指出，在美蘇兩極體系時期，美國和蘇聯先後失去了中國的支持，但這對兩極間的權力分配並無重大影響（1979：169）。就在北京開始改革開放之際，Waltz 說：

[1] 該名單包括土耳其、瑞典、荷蘭、西班牙、奧地利、法國、英國、普魯士／德國、俄國、義大利、日本與美國等 12 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有人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動員全國以快速增加生產，同時取得大規模的現代化軍事能力。該國能否達成其中任何一項目標都值得懷疑，而且絕不可能同時達成兩項……中國要成爲超級強權還差得很遠，無須加以考慮（1979：180）。

被 Alexander Wendt (1999: 19) 列爲 post-Waltzians 的 Stephen Walt 與 Randall L. Schweller，在其主要專書中都曾提及中國。Walt 與 Waltz 同被視爲守勢現實主義者。他在冷戰最後階段，以美蘇兩強與中東諸國間的互動爲例，討論聯盟起源的名著中，曾引述 Kissinger 與中國結盟，對抗比後者更強大的蘇聯之主張（Walt, 1990: 18）。除點到北京與中東國家的關係外（Walt, 1990: 63、231），中國也被 Walt 視爲能影響美蘇兩陣營權力分配之要角（Walt, 1990: 274）。列爲新古典現實主義者的 Schweller，在 20 世紀結束前出版之研究三極體系與二次大戰的專著中，提及中國被日本威脅與攻擊之事（1998：79、110、131、171）。在結論部分，中國的角色從受害者變成準備在不久的將來挑戰美國之潛在侵略者（1998：200-201）。

除 Schweller 外，前述幾位現實主義學者於冷戰時期發表的專書，主要聚焦於蘇聯與美蘇關係。包括 Schweller 在內，他們或多或少都曾對中國表示關切。然而在學界特具影響力的 Waltz，對中國評價較低。至於 Robert Keohane 與 Wendt 這兩位在非現實主義陣營中最具影響力的國際關係理論家（Maliniak et al., 2012: 48-49），原本對中國的關切程度更低。前者在探討後美國霸權的重要著作中對中國毫不關心（Keohane, 1984）；[2] 後者在 20 世紀結束之際出版的國際關係建構主義代表作中，也未論及中國（Wendt, 1999）。在這兩人的主要專書中，日本或歐洲國家遠比中國更重要。

---

[2] 該書索引顯示，作者曾多次提及比利時、巴西、英國、埃及、法國、德國、荷蘭、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義大利、日本、墨西哥、沙烏地阿拉伯、蘇聯、瑞典、土耳其等國，而阿爾及利亞、奧地利、芬蘭、希臘、印度、利比亞、尼加拉瓜、挪威、葡萄牙、南韓、西班牙、敘利亞、委內瑞拉也在書中各出現一次。至於「中國」（China）一詞完全沒出現在索引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21 世紀初

至少到 20 世紀結束時爲止，中國確實稱不上「超級強權」，實力絕不足以與美國相提並論。前述的 Schweller 雖表示中國可能挑戰美國，卻將日本與德國列爲與美國鼎立的另外兩極（1998：200）。但 21 世紀才剛開始，在 Waltz 之後最具影響力的現實主義者 John J. Mearsheimer 就提醒美國人注意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因爲它「幾乎必然會將經濟力量轉化爲軍事力量，並支配東北亞……中美兩國注定要彼此對抗」（2001：4）。Mearsheimer 還稱「國際體系結構強而有力的迫切需要，可能逼使美國在近期內放棄（對中國的）建設性交往政策……有跡象顯示，剛上臺的布希政府已開始朝此方向邁進」（2001：402）。

前述預測尚未實現，而且在 21 世紀的頭幾年，國際關係學界仍未將「中國崛起」視爲至關重要的研究議題。前曾提及之 Maliniak、Peterson 與 Tierney 等人的研究團隊於 2005 年公布，針對美國逾千名國際關係學者進行的調查研究顯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這個區域受重視的程度，不及「美國」、「加拿大與西歐」；在研究者列出的 11 個國際事件或議題中，「中國崛起」對學者們的研究之影響力居最後一名。[3] 在被問及哪個區域對當前美國最具戰略重要性之際，58% 的學者認爲是「中東和北非」、18% 認爲是「加拿大與西歐」，只有 16% 認爲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Peterson et al., 2005: 7、32-33、37-38）。

該研究團隊於 2007 年公布了針對更多美加國關學者的調研結果。「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這個區域受重視的程度和兩年前相似，然而「中國崛起」議題對美國學者們在研究方面的影響力，在 25 個事件或議題中提升到第七位。在被問及哪個區域對當前美國最具戰略重要性時，62% 的美國學者認爲是「中東和北非」。認爲「加拿大與西歐」最重要的比例下降到 13%，而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最重要的比例，則上升爲 19%

[3] 這 11 個事件或議題，依其受重視程度由高至低排列爲「冷戰終結／蘇聯瓦解」、「911 事件與其後的恐怖活動」、「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歐洲整合」、「種族屠殺與族群衝突」、「冷戰事件」、「民主化議題」、「布希主義／布希的對外政策」、「環境議題」、「中國崛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liniak et al., 2007: 10、36、40-41）。

前述研究團隊進一步將受訪對象擴大至十個通行英文的國家或地區，[4] 並於 2009 年公布了第三份報告。在該報告中，美國學者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對當前的美國最具戰略重要性之比例進一步提升（30%），但仍次於中東地區（46%）。當被問及當前對該國最重要的外交問題時，「中國力量的崛起」（The Rising Power of China）在 19 個問題中，被美國學者列爲第六。在考慮未來 10 年內對該國最重要的外交議題時，「中國力量的崛起」則被美國學者視爲第二重要的議題，僅次於「全球氣候變遷」。認爲中國經濟快速成長有助於國際穩定的美國學者（27%），略多於持相反看法的學者（25%）；然而認爲中國軍力增長會危及國際穩定的美國學者（43%）則遠多於持相反看法者（5%）（Jordon et al., 2009: 5、71、82、86）。此結果顯示，美國學者對「中國崛起」的關切程度已提升，而且擔憂其軍力增長。

到了 2012 年 5 月，該團隊又公布了針對廿個國家與地區之數千名國際關係學者的問卷調查結果。[5] 在被問及「你認爲世界上哪個地區，在今日對你的國家最具戰略重要性」時，46% 的美國受訪者選擇東亞。不論就全體受訪者或美國受訪者而言，「東亞」都是 12 個備選地區中最受重視者。在被問及「你認爲世界上哪個地區，在將來 20 年內對你的國家最具戰略重要性」時，美國學者選擇東亞地區的比例達 72%。當被問及當前對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議題時，「中國力量的崛起」在 29 個問題中排名第二。[6] 在考慮未來 10 年內對美國最重要的外交議題時，「中國力量的崛起」居首（Maliniak et al., 2012: 6、70-71、81-82）。

由此可見，中國的地位到 2012 年時已被美國國際關係學者肯定。儘管仍有人認爲，美國的優勢還能維持很長時間（Beckley, 2011/2012: 41-78；

---

4 接受調查的十個國家與地區爲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以色列、南非、新加坡、香港。

5 接受調查的 20 個國家與地區爲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法國、芬蘭、丹麥、挪威、瑞典、以色列、土耳其、香港、新加坡、南非、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

6 僅次於「阿拉伯之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ye, 2012: 215-217），至少後者已廣被視爲世界第二強權。現實主義陣營的 Fareed Zakaria 與非現實主義陣營的 Keohane & Nye，在 2008-2009 年的金融海嘯後，都高度重視美中關係（Zakaria, 2012: xv; Keohane & Nye, 2012: xxxii-xxxiv）。在國際關係學界極具影響力之期刊《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 於 2012 年還刊出一篇文章，將東亞的中國中心體系、德川日本的體系與西方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加以比較，並指出前兩個東亞體系在某些方面，比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更能適應 21 世紀國際政治（Ringmar, 2012: 1-25）。

權力轉移論的創始人 A. F. K. Organski 早在 1950 年代就以人口統計學爲依據指出，眞正有潛力凌駕美國的不是蘇聯，而是中國：

> 俄國或可趕上我們，卻未必能超越我們……中國的情形不同。她幾乎擁有無限潛力……將超越美國……問題不在於中國是否將成爲地球上最強的國家，而是她要花多長時間做到這一步……我們猜測，中國將於 40 到 50 年內工業化（1958: 446-447）。

果然，中國在 20 世紀末期加速成長，並取代日本，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以經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之國內生產毛額（GDP）爲準，國際貨幣基金會判定中國於 2002 年起超越日本（IMF, 2013），而 Maddison (2010) 更認定日本自 1992 年起便落後於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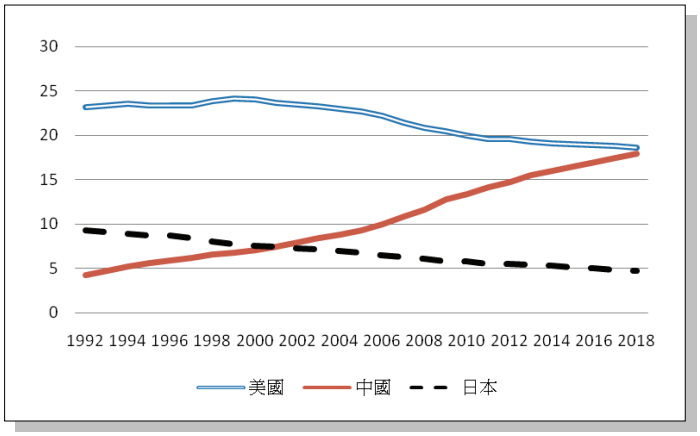
權力轉移論者主張，新興強國的實力逐漸趕上原本的體系主導強權時，就比較可能發起挑戰。套用到 21 世紀初的國際情勢，就意味著中國挑戰美國的機率正在上升。乍看之下，這與前述之攻勢現實主義者 Mearsheimer 的論斷相似，而權力轉移論也就和攻勢現實主義一樣，容易被用來支持「中國威脅論」（向駿，2006：33-90；吳玉山，2011：389-415）。不過這兩個都很重視體系結構與國家權力的學派，理論內容卻有很大差別，對中美關係走向以及對美國的政策建議，也有不同主張。接下來將簡述這兩種理論，並加以比較評析。

---

[7] 在前引之四份研究報告中，《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在同類型期刊中皆排名第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後冷戰時期美國、中國與日本的 GDP 占世界總值百分比之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依 IMF (2013) 數據繪製
說　　明：GDP 數字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2012 年及其後之數字爲估計值。

參、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的比較

一、攻勢現實主義

Mearsheimer 參酌了 Morgenthau 與 Waltz 的論述後，於 21 世紀一開始便提出其「攻勢現實主義」。他從下列五個預設命題（assumptions）出發，最後斷定大國會競逐權力、爭奪霸權：

1. 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
2. 大國都有進攻性軍力，得以傷害甚至摧毀對方。
3. 國家絕不可能確認他國的意圖。
4. 大國的首要目標是求生存。
5. 大國是理性行爲者（2001：30-31）。

在無政府狀態下，體系中的行爲者沒有可靠的求助對象。大國之類的強大行爲者都能傷害其他行爲者，而任何行爲者都無法確知其他行爲者是否有傷害自己的意圖。於是想繼續生存，又能理性地理解上述情況並採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動的行爲者，很可能會畏懼對方、採取自助行爲，盡量擴張自身權力（2001：32）。由於每個大國都會擴張自身權力，所以只有在達成權力平衡時才會出現和平。假如體系中沒有占優勢的國家，就比較可能維持和平（2001：336）。根據這樣的邏輯，中國的權力若持續快速提升，將會稱霸東北亞，使得中美衝突不可避免（2006：160-162；2010：381-396）。因此，Mearsheimer 建議美國政府採取行動，減緩中國的成長（2001：400-402）。

二、權力轉移論

權力轉移論者不同意 Morgenthau、Waltz 與 Mearsheimer 等現實主義者的看法。他們提出了另一種關於國際政治的論述（Tammen et al., 2000: 6-10）：

1. 國際體系有層級秩序，主導強權高踞權力金字塔頂端，維繫該秩序。
2. 層級秩序得以維持，除非某個國家有能力與意願改變現狀。

該理論也常被用來探討中美關係（Lemke & Tammen, 2003: 269-271）。將權力轉移論的邏輯應用到當前國際體系，就會發現原本由美國主導的層級體系，可能因中國崛起而生變。但最後會不會出現變化，或者變化是藉由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出現，要看北京的意願而定。Organski 與其後的權力轉移論者都了解，美國崛起後支持原主導強權英國的歷史顯示出，新興強權也可能維持現狀（Zhu, 2006）。若中國滿意於美國主導的現狀，就沒有動機加以改變。因此權力轉移論者除建議華府增強實力外，也要美國透過投資等方式營造良好的美中關係，讓北京接受現狀（Tammen et al., 2000: 158-162；Kugler, 2006: 36）。

三、兩種理論之比較

爲凸顯出這兩種理論的異同，作者以 Mearsheimer 的五項預設命題爲比較基礎：

1.「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權力轉移論者拒斥此命題，並主張國際體系有層級秩序。若無政府狀態是指沒有中央權威的狀態（Mearsheimer, 2001: 3、19），那麼現代國際體系當然屬於無政府狀態。但權力轉移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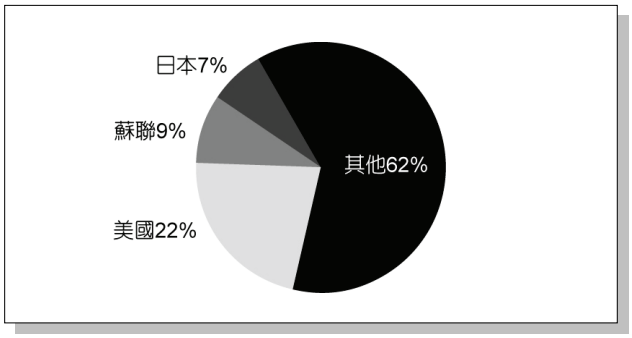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並非主張世界政府已經存在，而是主張體系主導強權具有政府的某些功能。體系內的中小國家在面臨安全威脅時，可以考慮請求主導強權保護——這往往比小國自助更有效。在二戰結束後受共黨勢力威脅的各政權，以及西亞的許多產油國，通常都可考慮請求美國保護，而美國也經常給予援助。所以在權力轉移論者描繪的國際體系中，中小國家可能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只是攻勢現實主義者認爲這完全不可靠。

當主導強權本身安全受威脅時，國際體系究竟屬無政府狀態或層級秩序其實無甚差別，因爲主導強權只能自助而無法倚靠他國。所以不論攻勢現實主義者或權力轉移論者，都建議美國政府增強實力以做好準備。

2.「大國都有進攻性的軍力，得以傷害甚至摧毀對方。」權力轉移論者對此並不否認，可是並未把軍事力量當作獨立的國力要素。對權力轉移論者而言，國力是人口、生產力與相對政治能力的函數（Tammen et al., 2000: 15），不過相對政治能力很難被準確地測量，所以他們常用人口數乘以人均產量（代表生產力）作爲衡量國力的簡易指標，也就是 GDP（特別是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之數值）（Lemke, 2002: 98-99）。蘇聯的 GDP 在冷戰時期大致居全球第二，可是美國的 GDP 始終爲蘇聯的兩至三倍左右。若將 1950～1991 年間各國的 GDP 加總比較，就會發現美國約占全球總產值 22%，而蘇聯僅約 9%，低於美國之半，與排名第三的日本差距不大。這看起來不像兩極結構，而比較接近美國獨自主導的體系：

圖 2　世界經濟規模最大的三個國家之產值比較
（1950-1991 年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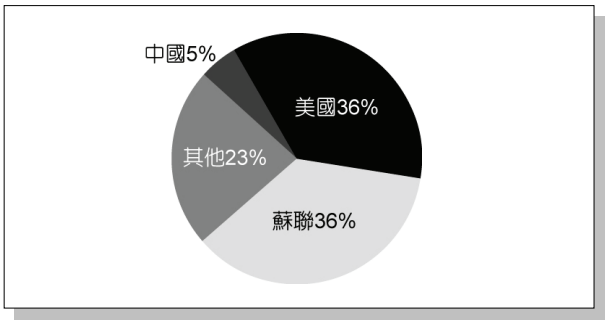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依 Maddison (2010) 數據繪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攻勢現實主義者也承認經濟力的重要性，但和許多其他的現實主義者一樣，更重視軍力（Mearsheimer, 2001: 83-137）。若將 1950～1991 年間各國軍費加總比較，就會發現美國與蘇聯各約占全球總軍費的 36%。排名第三的中國僅約 5%，完全不能與美、蘇相提並論。從軍事角度看，這很明顯是兩極體系：

圖 3　世界軍費最高的三個國家之比較
（1950-1991 年總和）



資料來源：依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0) 數據繪製

若依軍費衡量，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強勢均力敵，所以冷戰和平可以被 Waltz 與 Mearsheimer 等現實主義者當作權力平衡有利於和平的經驗證據。若依 GDP 衡量，冷戰時期的美國擁有明顯優勢，蘇聯從頭到尾都沒有足夠實力挑戰美國，所以冷戰和平也可以被權力轉移論者當作支持其理論的經驗證據（Pax Americana）。就此而論，究竟勢均力敵的情勢有利或不利於和平的爭辯，與這兩個學派之權力衡量方式差異有關。

3.「國家絕不可能確認他國的意圖。」Mearsheimer 因此主張國家要做最壞打算。權力轉移論者認爲，即使一國的意圖無法被百分之百確認，但未必不能被部分地了解。因此，該學派嘗試找尋客觀指標，以捕捉國家的眞實意圖。這將留待本文第四部分探討。

4.「大國的首要目標是求生存。」權力轉移論者認爲大小國家都會追求國家利益，可是並未特別凸顯出大國與小國在這方面有無差異，也未強調「生存」的重要性凌駕於其他利益之上。不過這個命題並非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的爭辯焦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大國是理性行爲者。」權力轉移論者對此完全同意，而且他們認爲中小國家也是理性行爲者。事實上，權力轉移論者不願意被稱爲現實主義的一派，卻願意被稱爲「理性主義者」（Tammen et al., 2000: 6）。

這兩個學派主要都以 19、20 世紀的歷史經驗爲證據支持己說：Mearsheimer (2001) 以數個西方強權與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個案爲依據，最後斷言中國也必然採取相同行動，中美間的衝突無可避免。權力轉移論者 Douglas Lemke 則對列強以及中東、遠東、南美和非洲諸國所組成的各體系進行大規模量化分析，發現當某國對主導強權不滿，而且又取得與主導強權相若的力量時，戰爭爆發的機率會升高。當列強皆未對主導強權不滿，也未能與主導國匹敵時，戰爭爆發的機率約 3%；若有不滿現狀的強權能與主導國勢均力敵時，戰爭發生率約 34.6%（2002：181）。要特別指出的是，儘管戰爭發生率相差 11 倍，但 34.6% 的機率還不到五成，與攻勢現實主義者聲稱的「必然」差異極大。

綜上所述，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都接受國家中心論，認爲國家會理性地追求其利益，而且也都很重視國家權力。然而兩者對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之看法針鋒相對、對國家權力的主要面向與測量方式各有所偏、對是否該探求國家意圖的主張更是南轅北轍。Mearsheimer 主張只要關注權力變項即可，但權力轉移論者認爲權力變項與意圖變項都很重要。本文的第四部分，將簡述權力轉移論者用來衡量一國是否有意修改現狀之客觀具體指標。

肆、權力轉移論者評估現狀修正意圖的指標

Lemke 在將該理論應用到東亞、中東、南美與非洲等區域體系時，曾對各種可能用來衡量一國對於現狀滿意度的指標做了完整檢討，並肯定「異常軍費開支」以及「與主導強權之軍事同盟體系的相似性」這兩種指標的價值（2002：99-109）。以下便簡述這兩項指標：

一、軍事同盟組合的相似程度（Alliance Portfolio Simila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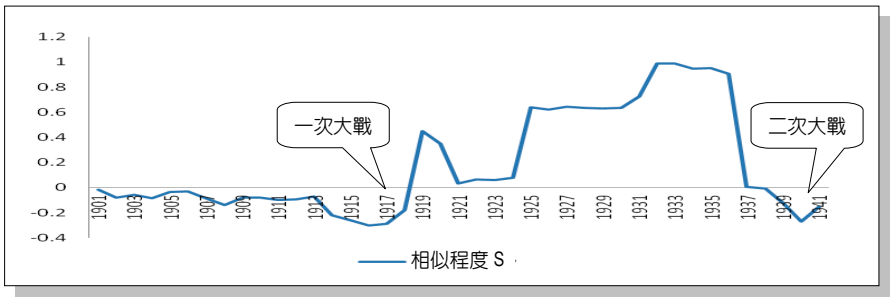
假設國際秩序是主導強權依自身利益所建立，該強權必然滿意於國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狀，而且很可能建立軍事同盟體系來加以維護。若另一強國加入此同盟體系，意味該國不打算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反之，若某強國不加入該體系，就顯示該國未必會維護國際現狀。主導強權以外的國家所參與的軍事同盟體系，與主導強權所參與的同盟體系重合程度愈高，就表示它對現狀的支持程度愈強。倘若某強國不但不加入主導強權的同盟體系，甚至聯合其他不加入的國家組成對抗性同盟，就表示它對國際現狀強烈不滿，很可能準備以武力改變現狀（Kim, 1991: 833-850；Lemke, 2002: 100-102）。許多學者都以此指標，衡量國家對國際現狀的滿意程度（Lemke & Reed, 1998: 511-516；Kim, 2002: 654-671；Bussmann & Oneal, 2007: 88-111）。

對權力轉移論者而言，最重要的經驗證據就是 20 世紀前半的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在 GDP 超越英國後不久就發動戰爭（Tammen et al., 2000: 51-52），而軍事同盟相似性指標則顯示出，戰爭正好爆發於該指標的低谷。將 1901 年起到蘇聯與美國捲入二次大戰的 1941 年間，德國與當時的體系主導強權英國間之同盟組合相似程度繪成折線圖，就可清楚發現該指標與戰爭間的明確對應關係：

圖 4　德國和英國之軍事同盟組合相似程度變化情形（1901-1941）



資料來源：依 Bennett & Allen (2000) 研發之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Data Generation Program (EUGene program) 計算出之數據繪製

說　　明：Y 軸數值代表兩國在歐洲的軍事同盟組合相似程度 S。指標爲 1 時，代表雙方擁有 100% 相同的軍事同盟組合；兩國之間的軍事同盟組合相似性爲 -1 時，代表完全相反的軍事同盟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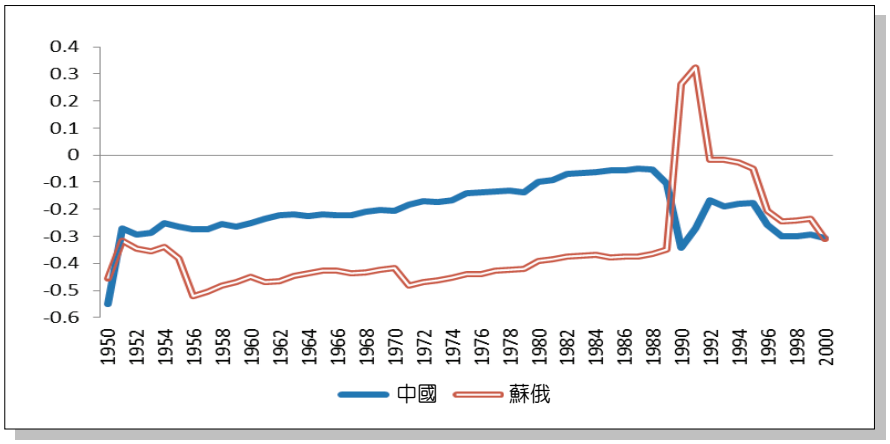
圖 4 清楚顯示出，德國與英國之軍事同盟體系相似程度 S 的兩個低谷，與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密切對應，而在兩國關係友好的威瑪共和期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盟相似程度也處於高峰。對權力轉移論者而言，該指標的效度（validity）已得到肯定。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美國與蘇聯分別締造對立的軍事同盟體系。美國陣營包括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以及西太平洋地區的日本、大韓民國、中華民國、澳洲與紐西蘭等。加入此陣營而非蘇聯陣營的國家，與美國的軍事同盟組合相似程度指標較高。反之，蘇聯陣營的共產主義國家，與美國的軍事同盟組合相似程度較低。從華府的角度來看，偏低的相似度就意味對（美國建立的）國際現狀不滿。在冷戰期間，中蘇兩大共產強權，和主導全球的美國間之軍事同盟組合相似程度始終是負值：

圖 5　中蘇與美國之軍事同盟組合相似程度變化情形
（1950-2000）



資料來源：同圖 4
說　　明：Y 軸數值代表蘇俄或中國在全球與美國的軍事同盟組合相似程度 S。
1991 年後，蘇聯爲俄羅斯所取代。

權力轉移論者會認爲，圖 5 縱軸的數值反映出中蘇共對美國所建立之國際秩序的不滿。其中蘇聯不滿程度特別強，只因力量不足才未發起挑戰。冷戰結束之際，美俄關係一度大幅好轉，而北京則被華府視爲主要對手。不過莫斯科與華府的蜜月期爲時不長，前者的不滿程度又增強到與北京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的水平。但是後冷戰時期的北京或莫斯科，與美國的差異程度仍小於冷戰時期的美蘇差異。

EUGene 軟體的資料庫對 21 世紀以來的數據蒐集並不齊全，不過在 2000 年後，華府與北京各自的軍事同盟組合並未出現太大變化：北京仍與平壤結盟，沒有加入美國的同盟體系。因此，美國與中國在這方面的相似度仍是負值。

二、異常軍費開支（Extraordinary Military Build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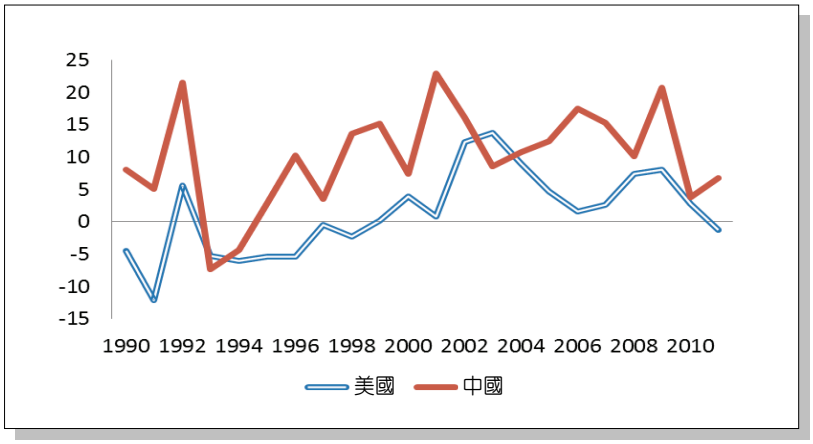
另有權力轉移論者認爲，異常大量的軍費開支，代表該國爲改變現狀所做之努力。若一國對現狀不滿，就很可能增加軍費，準備挑戰體系主導強權。因此，某國的軍費增長速度比往年快，而且也比主導強權的軍費增長速度更快時，就意味該國對現狀不滿。Lemke 等採用此一指標的學者皆以十年爲一單位，比較某一國家與體系主導強權之軍費增長情形，以判斷該國是否有意改變現狀。經驗證據顯示，1860 年代的普魯士與 1900 年後的德國，都有異常的大量軍費開支，隨後便爆發了普法戰爭與世界大戰。同時期的法國大致上沒有異常軍費開支，可被視爲現狀國家，至於蘇聯則一直都有大量異常軍費開支（Lemke & Werner, 1996: 235-260）。[8]

爲了用這個指標來衡量北京對國際現狀的滿意程度，作者將美中的軍費年增百分率變化繪製成圖 6：

[8] 其他採用此一量標的文獻還包括 Werner & Kugler (1996: 187-2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6　美國與中國之軍費年增百分率變化情形（1990-2011）



資料來源：依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2) 數據繪製
說　　明：Y 軸數字代表軍費年增之百分率。

由於資料來源並未提供更早期的軍事開支，因此圖 6 無法直接與圖 5 的所有時段進行對比。但圖 6 仍顯示出，自 1990 年以來，北京的軍事開支增長速度，大致都凌駕於華府之上。在這 22 年中，北京有 11 年（1992、1995、1996、1998、1999、2001、2004、2005、2006、2009、2011）的軍費增長速度既高於華府的增長速度，又高於自己在前一年的增長速度。

假如仿照前述 Lemke 等學者的做法，以十年爲一單位加總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則可得知北京在 1990 年代的軍費總開支約 2,272.57 億美元，到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開支增至 6,738.48 億美元，增幅超過 196.51%。華府在同期之軍費開支分別爲 4.19 兆與 5.26 兆美元，增幅約 25.38%。該資料庫並未提供更早期的數據，因此無從得知北京的軍費開支增速是否比前一時期更高，無法依照權力轉移論者的標準做法判定其是否有意改變現狀。但就每一個別年份觀察，最近有一半的時間符合「不滿現狀」的判準。雖然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軍費總金額超過共軍軍費總額十倍，但華府還是感到擔憂。

最近有學者認爲前述兩項指標都不足以服眾，所以用政治領袖出訪頻率作爲替代指標，以判定北京對外政策傾向。與官方對外言論相較，高層領袖實際出訪的成本要高得多，代表意義也更重大。研究者對 1998 至 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間，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以及國務院總理出國訪問的資料進行統計，探討北京與所謂的「流氓國家」（rouge states，例如北韓和蘇丹）、其他躍升中之強權（例如印度和巴西）、美國的敵國，以及美國在亞洲的盟邦之間的關係。若中國層峰領導訪問這些國家的頻率顯著高於平均值，意味北京可能在爭取反美國家支持，或破壞美國的同盟體系，以利挑戰現狀。該研究結果顯示，中共總書記與總理出訪所謂「流氓國家」的頻率偏高，但並未特別頻繁地訪問另外三類國家。因此研究者認爲，中國大致滿意於國際現狀（Kastner & Saunders, 2012: 163-177）。只是此新指標與前述指標不同，尚未被運用於跨國比較，其效度還有待進一步檢驗。

伍、綜合評析

目前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已肯定中國的重要性，並認爲其可能繼續縮小與美國間的權力差距。然而經常被用來探討中美關係的權力轉移論與攻勢現實主義，著重的權力指標不同。

IMF 以權力轉移論者採用的 GDP 指標，估計中國經濟規模即將與美國並駕齊驅（圖 1）。權力轉移論者認爲，這與兩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經濟規模趕上英國的情勢類似，意味中國向美國發起挑戰的機率在短期內將升高。但美國學者較少提及的是，依據權力轉移論的邏輯，中國若能繼續維持遠高於美國的經濟成長率，將很快拉大差距，衝過權力轉移的危險期，無須發動戰爭便成爲新主導強權。另外，中國經濟擴張，與中美貿易和金融之相互依存密切相關。對美用兵顯然會嚴重損害中國利益，危及共產黨之地位。這與當年世界大戰前德國所面臨的情勢截然不同。圖 1 也顯示出，中國的 GDP 於 2002 年超越日本。當時後者由小泉總理執政，與北京間的摩擦甚烈。就某種程度而言，這可視爲支持權力轉移論的證據：中日在東亞權力轉移時期處於緊張對立狀態。但兩國間畢竟沒有發生戰爭。本文第二部分引述之調研結果也顯示，美國國際關係學界並不擔憂中國之經濟擴張。這意味著多數美國學者不認爲兩國經濟規模差距的縮小即將引發戰爭。中國應該比較樂意仿效從前美英和平權力轉移的途徑，所以華府與北京間可能出現經濟與政治、外交糾紛，然而爆發熱戰的機率不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攻勢現實主義者也認爲中國會仿效昔年美國的作法，但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在亞洲取得美國在美洲的霸主地位（Mearsheimer, 2013: 79-93）。圖 2 顯示出，北京軍費的增速高於華府。前引之調研報告顯示，43% 的美國學者認爲中國軍力的增長不利於國際穩定。這也是攻勢現實主義者的想法。不過即使兩國都維持 1990 年以來的軍費增加率，美國仍可維持優勢 20 年。更何況共軍從遠遠落後於美軍的基準出發，光是汰換老舊裝備就要耗費大筆資金，很難在二、三十年內與美軍匹敵。攻勢現實主義者主張，中國最終會將經濟力轉化爲軍事力，但這是很久以後的事。美國要在此前阻止中國成長。若按此邏輯，主動挑起衝突的將是華府而非北京。歐巴馬政府執行的「重返亞洲」政策，就被視爲華府對北京發動攻勢的證明（張登及，2012：11-16）。認爲共軍實力增長不利於國際穩定之美國學者仍不到半數，而且他們也未必主張要對中國發動先制攻擊。不過北京若認定美國會依攻勢現實主義者的建議行事，可能會加快建軍腳步，使雙方的戰爭成爲自我實現之預言。

作者認爲，前述兩種關注國際權力結構的理論，皆有不足之處。首先，GDP 或軍費開支都未被普遍接受爲衡量國力的指標。權力轉移論者主張用 GDP 指標，而且要經購買力平價調整。這可能高估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的實力（Mearsheimer, 2001: 62-63；陳欣之，2011：14）。純以軍費衡量國力，則可能高估美國的實力。有學者採折衷作法，將 GDP 與軍費開支按比例調整後，取其平均作爲國力指標，以兼顧軍事與經濟層面（Wu, 2011: 1-42）。這可能比較準確地反映出當前華府與北京的權力對比。另一種作法是將軍事與經濟層面加以區分，認定美國是軍事體系中的獨一超強，而中國、美國、日本與歐洲都是經濟體系中的要角（Nye, 2012: 215）。

其次，權力分配結構雖有影響力，卻只能解釋一小部分的國際衝突與合作之變化（唐欣偉，2010：95-97）。攻勢現實主義者國強必霸的說法固然簡約，但能力與意願未必能畫上等號。[9] 權力轉移論者兼顧能力與意願兩個解釋變數，可能提供較強解釋力。問題是，假如用軍費異常增長或

[9] Mearsheimer 在較晚近探討結構現實主義的文稿中，稍微修正了早先較具決定論色彩的主張，認爲中美兩國可能開戰，但可能性不是非常高（2013：79-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事同盟組合作爲國家維護或改變現狀意願之指標，仍無法將能力與意願區分開來。前已述及軍事開支既可視爲國力指標，亦可視爲不滿現狀之指標。軍事同盟組合也有類似問題。此外，中國沒有與任何一個美國盟邦締結軍事同盟，卻和非美國盟邦的北韓結盟，北京與平壤的同盟就成爲中國對現狀不滿的證據之一。但北京若眞的與美國在亞洲、歐洲、美洲的盟邦締結軍事同盟，理論上會提升其與華府的軍事同盟相似度，顯示無意改變國際現狀，然而華府對此恐怕並不樂見。此舉甚至可能被解釋爲中國正在累積實力，以挑戰美國領導地位。前述的 Kastner 與 Saunders 也認爲，中國高層對美國在亞洲之盟邦的訪問，可能被解釋爲挑戰現狀而非維護現狀的舉措。所以軍事同盟相似度與現狀滿意度之間的關聯仍有爭議。

對中國有深入研究的 Alastair Iain Johnston 具體地從一國是否積極挑戰國際制度與規則，以及是否想改變國際權力分配情勢，對北京的行爲與意向加以評估，結果認定其無意挑戰現狀（Johnston, 2008: 34-96）。David Lampton 與 David Shambaugh 這兩位中國事務專家也有類似主張（Lampton, 2005: 306-326；2008: 253；Shambaugh, 2005: 1-2）。可是許多攻勢現實主義者與權力轉移論者卻認爲中國有意挑戰現狀，而美國才是維護現狀的強權。作者認爲這兩個由美國學者提出的理論，都隱含「美國例外」的想法，這是它們的第三項不足之處。例如 Mearsheimer 主張所有大國都會盡量擴張，但在討論到美國的行爲時卻又引入不在其基本預設命題中的其他解釋變項，表示美國的擴張是有限度的（2001：234-266）。權力轉移論者一開始就預設主導強權一定會維護現狀，只有主導強權以外的國家才可能對國際現狀不滿。因此，他們用來衡量對現狀滿意程度的指標，都是以主導強權做爲比較基準。然而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尤其是在小布希執政時期，卻一再地片面改變國際現狀。這些都有待前述理論家們妥善回應。

簡言之，攻勢現實主義者與權力轉移論者皆認爲中美關係可能趨於緊張，值得密切注意。作者也表贊同。但它們都隱含「美國例外」的想法，而且對權力的衡量方式也未能取得學界共識。攻勢現實主義者僅憑能力變數進行解釋和預測，對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估計過高；權力轉移論者兼顧能力與意願變數，但用來衡量意願的指標仍擺脫不了能力面向。因此學者宜避免「美國例外」的缺失，再仔細思考權力、意願等概念，設計出能更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確捕捉這些概念的可操作指標，然後對攻勢現實主義、權力轉移論等理論加以檢證與修訂，才能以更具解釋力的理論來探討未來華府與北京的關係。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向　駿，2006，〈權力轉移理論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向駿（編），《2050 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臺關係之迷思》，台北：博揚文化，頁 33-90。

吳玉山，2011，〈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頁 389-415。

唐欣偉，2010，〈頂尖兩強的雙關係（一六六〇至二〇〇六）〉，《政治科學論叢》，44: 75-104。

陳欣之，2011，〈霸權與崛起強權的互動—美國對中國暨印度的策略〉，《遠景基金會季刊》，12(1): 1-41。

張登及，2012，〈希拉蕊訪問大陸周邊國家戰略意涵：攻勢現實主義的分析〉，《展望與探索》，10(8): 11-16。

二、英文部分

Beckley, Michael. 2011/2012.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3): 41-78.

Bennett, D. Scott & Allan Stam. 2000. “EUGene: A Conceptual Manual.”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6(2): 179-204.

Bussmann, Margit & John R. Oneal. 2007. “Do Hegemons Distribute Private Goods? A Test of Power-transition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1(1): 88-111.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0.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version 4.0).” in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10.

IMF. 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n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3/02/weodata/index.aspx. Latest update 8 October 2013.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8. “Beijing's Security Behavior in the Asia-Pacific—Is China a Dissatisfied Power?” In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eds. J. J. Suh, Peter J. Katzenstein, & Allen Carlson. Singapore: NUS Press, 34-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ordon, Richard,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 Michael J. Tierney. 2009.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in http://www.wm.edu/offices/itpir/_documents/trip/final_trip_report_2009.pdf. Latest update 16 October 2013.

Kastner, Scott L. & Phillip C. Saunders. 2012.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a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1): 163-177.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2012. "Preface to the Fourth Edition." In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s.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Boston: Longman, xxvii-xxxiv.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m, Woosang. 1991.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833-850.

Kim, Woosang. 2002.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5): 654-671.

Kissinger, Henry A. 1969.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Kugler, Jacek. 2006. "The Asian Ascent: 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7: 36-42.

Lampton, David M. 2005. "China's Rise in Asia Need Not Be at America's Expense." In *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ed. David Shambau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06-326.

Lampton, David M. 2008.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mke, Douglas & Ronald L. Tammen. 2003.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9(4): 269-271.

Lemke, Douglas & Suzanne Werner. 1996.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2): 235-260.

Lemke, Douglas & William Reed. 1998. "Power Is Not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2(4): 511-516.

Lemke, Douglas. 2002.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ddison, Angus. 2010.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in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Latest update 16 October 2013.

Maliniak, Daniel,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 Michael J. Tierney. 2007. "The View from the Ivory Tower: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http://www.wm.edu/offices/itpir/_documents/trip/ivory_tower_view_2007.pdf. Latest update 16 October 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liniak, Daniel, Susan Peterson, & Michael J. Tierney. 2012. "TRIP around the World: Teaching, Research and Policy View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20 Countries." in http://www.wm.edu/offices/itpir/_documents/trip/trip_around_the_world_2011.pdf. Latest update 16 October 2013.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earsheimer, John J.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105(690): 160-162.

Mearsheimer, John J. 2010.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4): 381-396.

Mearsheimer, John J. 2013. "Structural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3rd)*, eds. Tim Dunne, Milja Kurki, & Steve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7-93.

Morgenthau, Hans. 195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Nye, Joseph. 2012.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Not Be a 'Post-American'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 215-217.

Organski, A.F.K. 195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eterson, Susan, Michael J. Tierney, & Daniel Maliniak. 2005.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actices, Views of the Discipline, and Policy Attitud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ttp://www.wm.edu/offices/itpir/_documents/trip/trip_summary2005.pdf. Latest update 16 October 2013.

Ringmar, Erik. 2012. "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6(1): 1-25.

Schweller, Randall L. 1998.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ambaugh, David. 2005.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In *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ed. David Shambau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0.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2. "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in http://milexdata.sipri.org/. Latest update16 October 2013.

Tammen, Ronald L.,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 A.F.K. Organski.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in http://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GlobalTrends2030.pdf. Lates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pdate 16 October 2013.
Walt, Stephen.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rner, Suzanne & Jacek Kugler. 1996. "Power Transitions and Military Buildups: 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 In *Parity and War*, eds. Jacek Kugler & Douglas Lemk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87-207.
Wu, Yu-shan. 2011. "Power Shift, Strategic Triangle, and Alliance in East Asia." *Issues and Studies* 47(4): 1-42.
Zakaria, Freed. 2012. "Foreword." In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s.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Nye. Boston: Longman, xiii-xv.
Zhu, Zhiqun. 2006.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ower, Transition, and Peace*. New York: Routled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valuations of China 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Offensive Realism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Hsin-wei Tang***

Abstract

Before the 21st century, very f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become almost as powerful as the United States. Scholars only started to depict China the most significant rival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s rise had become undeniable.

On the basis of power politics, offensive realists claim that a powerful China will challenge the United States, so Washington should obstruct China's growth. However, power transition theorists use the same power politics to argue that a satisfied emerging power will not challenge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quo.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operate with China. These two schools disagre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issue of national intentions. The disagreement over China's intentions has led to oppos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Washington.

Keywords: Rise of China, Offensive Realism,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Military Expenditures, GDP

---

* DOI:10.6166/TJPS.58 (47-70)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hwtang@mail.fg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